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刘辉
编

恽代英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刘辉
编

恽代英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恽代英卷/刘辉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300-20079-8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恽代英 (1895~1931)-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6802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恽代英卷

刘辉 编

Yun Daiying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37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95 000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 1840 年到 1949 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恽代英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品德高尚，才华出众，被誉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他不仅是卓越的政治活动家，也是著名的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他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恽代英留下了大量思想论著，堪称中国近代宝贵的思想财富。

—

恽代英，字子毅，又名遽轩，笔名众多。1895年8月12日（农历六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昌老育婴堂街一个书香世家，祖籍江苏省武进县（现常州市）。清末时，他的祖父以候补知县分发湖北，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举家西迁。父亲恽宗培，曾在湖北老河口、德安等府州县任职。母亲陈葆云，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仕宦之家。

恽代英从小入家塾学习，1905年考入武昌龙正初等小学堂。两年后考入武昌北路高等小学堂学习，该校为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读书期间，由于聪颖好学，且文采出众，常“为师长赞美”，有“奇男儿”之称。1908年末，恽代英以甲等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本有机会被派赴美留学，因其母念其年幼不舍而未能成行。1909年，父亲恽宗培谋得老河口盐税局长一职，母亲随后亦带代英等兄弟四人迁居此地。因当地无中学可入读，他在母亲辅导下，阅读《纲鉴易知录》、《战国策》、《古文观止》、《饮冰室文集》等著作，并开始学习英文。1913年，恽代英以优异成绩考进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预科，后转入该校文科中国哲学门学习。在校期间，他于1917年10月创办互助社，该社以“群

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成为五四时期武汉地区诞生的第一个进步团体。次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华大学，并留校任附中部主任。

五四运动爆发后，恽代英和互助社的成员热烈响应。他书写《四年五月七日之事》、《呜呼青岛》等传单散发，并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和集会，掀起了武汉三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浪潮，成为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人。

1919年10月，恽代英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此后，受学会委托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随着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恽代英热烈追求新思想，并于1920年2月和林育南等人在武汉创办了利群书社。书社有志于传播新文化，专门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籍以及《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成为武汉地区宣传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在中华大学学习和工作时期，恽代英不仅组织社团、创办书社，还在《东方杂志》、《光华学报》、《青年进步》、《妇女杂志》、《新青年》、《端风》、《少年中国》等著名刊物发表大量文章，宣传新思想，推动了武汉地区的新文化运动，他本人也逐渐成为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一颗新星。

在当时各种新思潮、新主义流行的情况下，恽代英经过认真研究、实验、比较，最终抛弃了一度受到影响的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等思潮，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他和林育南等人在湖北黄冈成立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组织——“共存社”，并于当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一直以来在青年中的影响力，恽代英加入中共后，继续从事青年工作。1923年，他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增补为团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他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还和萧楚女、邓中夏等创办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并担任主编。《中国青年》在恽代英的主持下，宣传、讨论、报道的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该刊不仅内容丰富，且形式活泼，最高时发行量达3万多份，代表了当时中共所领导的思想文化事业的水平与成就，很快成为早期青年运动的一面旗帜，也是当时中共的主要理论阵地之一。

除了负责主编《中国青年》外，恽代英还以“代英”、“英”、“但一”、“F. M.”等为名，陆续在该刊发表了200多篇论文与书信，这些

论文热心分析中国国情与现状，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和前途问题，吸引不少青年投身革命洪流，同时也为中共探索新民主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革命时期，恽代英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这期间，他致力于改组国民党的工作，积极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同时与打着全民革命旗帜的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展开了公开的论争。恽代英还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并著有《五卅运动》一书，对这次运动作了全面总结。

1926年1月，恽代英出席国民党二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奉命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兼中共党团书记。为加强中共对军校的领导，恽代英支持周逸群等在军校组建青年军人联合会，同蒋介石扶持的孙文主义学会作斗争，致使蒋介石极端仇视，诬称恽代英与邓演达、高语罕、张治中为“黄埔四凶”。1927年，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恽代英来到武昌，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并主持军校日常工作，同时，在党内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支持工农运动，并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四一二”政变后，恽代英与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一道严厉谴责蒋介石镇压破坏各地工农运动的罪行，主张坚决讨蒋。当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联蒋反共、率部进攻武汉时，恽代英亲率由武汉中央军校学生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改编的中央独立师，配合叶挺部队参加讨伐夏斗寅的战斗，并在鄂南重镇咸宁大败叛军，暂时稳定了武汉局势。

大革命失败后，恽代英先是撤离武汉抵达九江，与周恩来一道，参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共前敌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后随起义军南征，部队在广东潮汕遭挫后，从甲子港乘船去香港。12月，与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新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中共六大后，于1928年底赴上海，从事艰苦的地下斗争，秘密主编中共机关刊物《红旗》，一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协助周恩来工作。1929年6月，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1930年，因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已开始冒头的李立三“左”倾错误，恽代英受到李立三的指责，旋即被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调离中央工作，先调任沪中区行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又调任沪东区行委书记。同年5月，在上海杨树浦老怡和纱厂（现上海第五毛纺织厂）门口等候工人

代表前来联系工作时，不幸被捕。不久以“煽动集会”的罪名，被判五年徒刑。在狱中，恽代英坚持与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给狱友讲述“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及意义，为工人编写读物。

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后，提出不惜一切代价营救恽代英出狱。但由于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将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监狱的消息报告国民党，营救工作遂告失败。蒋介石曾令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劝降，遭到严厉拒绝。在狱中，恽代英留下了气壮山河的七绝一首：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拚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在南京慷慨就义，时年36岁。

二

恽代英从19岁开始发文，留下了300多万字的遗著。这些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哲学、政治、文化、教育、经济、军事等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在早期中共党人中也是相当突出的。概括而言，恽代英一生思想最有特色的部分，主要表现在早期对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的探讨，对真正民主政治的追寻，以及后来以“阶级斗争”为旨趣对改造中国之革命道路的政治探索等多个方面。下面，我们根据学界已有的研究，对其思想线索和特色略作绍述。

首先，谈谈恽代英早期关于哲学问题的探讨。

恽代英1913年进入中华大学预科学习，1915年转入中国哲学门，1918年毕业，几年的专业学习，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哲学功底，激发出浓厚的哲学兴趣，他早期的论文中不少都是探讨哲学问题的。其哲学思考不仅相当有系统，而且在物质实在论和认识论等方面，还达到较高的水平。1917年他曾拟定一份打算写作的哲学论文提纲，包括（一）世界观：物质实在论、心灵实在论、假定一元论（以太）；（二）人生观：生死自由论、慈善自由论、苦乐之真义；（三）认识论：智识与经验、怀疑论；等等。^①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只重点阐发了关于“物质实在论”和有关认识论方面的思想，但已能显示出其思想的光华。

恽代英坚持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必为实

^① 参见《恽代英日记》，13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在。他在1917年3月发表的《物质实在论——哲学问题之研究》一文中，集中阐发了这一思想。该文首先列举和批判了绝对实在说、假定实在说、批评派实在说、物质非实在说等欧洲近代哲学史上对于这一理论的四种不同观点，认为上述“四说”都没能正确解释物质“实在”问题。在对其作了批判后，他明确提出了“物质必为实在”的观点，并从人直觉的形成“必待感官受外物之刺激而后发生”，某一事物作用于不同的人 and 不同时间的人会引起同一的、共同的感觉和认识，以及从“真境”与“幻境”的区别性等多个角度给予证明。比如关于真境与幻境的区别，他就指出：“真幻之分明，真境之必有对象了然矣。且真境明显，幻境暗昧，真境可分拆，可集合，有原因，有结果，而幻境一切反是。凡此各种区别，皆足知真境之有客观实在物质之关系，非如幻境完全为主观一方面之活动也”^①。

在中共党人的杰出代表中，恽代英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较早论述“物质必为实在”思想的人，其研究也较李大钊、瞿秋白的相关论述更为深入。需要指出的是，在提出“物质必为实在”这一唯物主义思想之后，恽代英继续探索世界的本源时，一度受到当时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以太”说的影响（由于不知爱因斯坦“相对论”提出后，“以太”假说在西方正逐步被否定这一西方学界的重大进展），曾得出“以太为万物之根本”的阶段性认知结论。^②好在不久之后，他对这一认知缺陷又有一定的觉悟，并作出某种修正。^③

恽代英的认识论思想，也体现出唯物主义的色彩。但相对于物质观，其对认识论的探讨和论述要显得更为丰富和深刻。恽代英将自己的认识论分为“智识与经验”和“怀疑论”两部分，他曾于1915年与1917年分别发表《怀疑论》和《经验与智识》两文，并自认为后者乃其“认识论中最有价值之文字”。^④

“智识来源于经验”，这是恽代英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他明确反对所谓“天启之智识”，认为“凡可名为智识者，或由吾人简单之经验而认识之，或由吾人复杂之经验而推知之。前者如声色臭味之辨别，后者如各种学术之原理。总之凡可称为智识者，非直接从经验中得来，

① 《恽代英文集》，上卷，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② 参见《恽代英日记》，26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③ 参见上书，274页。

④ 参见上书，130页。

即间接从经验中得来。舍吾人一切经验之外，欲求一种可称为智识者，盖渺不可得也”^①。

虽然主张知识来源于经验，但恽代英并不是一个片面的经验论者。他认为经验往往反映的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要完全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就必须对经验加以反复研究。堆积经验于知识无益。他以牛顿见苹果坠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瓦特见壶水沸而发现蒸汽力原理为例，说明经验必待研究而后成其为知识。^② 比如“吾人见白色之日光，即以日光为白色，此即不正确之单纯经验也。经物理学家研究，然后知日光非白色，而为七色所合成”^③。由此，恽代英把“学问”与一般知识加以分别，认为“学问者，反复经验所得较正确的智识之传授也”，从而既坚持了唯物论，又体现出认识的辩证性。

在认知方法和工具上，恽代英极为看重“怀疑”的价值和意义。他指出，由于人们在认识上存在“习俗”、“信仰”、“感情”、“耳目”等的障蔽，常常难以见及真理。要促进人们思想解放、打破思想僵化状况，必须对一切事理都要持一个怀疑的态度。“我的意见，是以为对于一切事理，都要存一个怀疑的态度；然而对于怀疑的事理，应该研求；研求出来的结果，我们仍然要用个怀疑的态度看待他”^④。他甚至强调说：“世界各方面的进化，都起源于怀疑”^⑤。

虽然主张对一切事理都要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但恽代英又坚信世界是可知的，反对由怀疑论而走向不可知主义。为此，1920年4月，他再作《怀疑论》一文，阐明了自己的思想和怀疑论鼻祖古希腊辟罗（皮浪）思想之间的异同，表示“我于辟罗对于一切事理都持一个怀疑的态度，是很赞同的；却对于他那所说真事理不能研求出来，而且不必研求出来的话，根本上很反对”^⑥。

为了进一步阐释可知论，恽代英还批判了近代康德的“人智范围说”，认为康德把人智只限于物界的现象、否认人的认识能达到“自在之物”本身，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武断之说。针对康德以人的感觉能力的有限性来证明人的知识能力有限性的观点，他指出，“康德以为人的智

① 《恽代英文集》，上卷，48～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② 参见上书，49页。

③ 同上书，50页。

④ 同上书，156页。

⑤ 同上书，158页。

⑥ 同上书，150页。

识，必定限于感官摄取的映象，这便是他立论的根据；然而人智并不限于感官，科学的进步，已经为我们证明了许多超感官的事理”^①。恽代英明确表示，人智是一天天进化的，人智范围一定有随着时代发展以扩张的可能性。“人类只要肯前进，我虽不敢担保他有一天得着他所求的真事理，照已往的推测未来，应该是很有希望。那以为真事理一定是不能研求得到的话，总是错了。”^② 恽代英认识论的可贵之处，实在于从怀疑出发，又从中揭示出人类认识不断发展的可能性。

总之，恽代英是五四时期在认识论方面做过比较系统探索的少数思想家之一，他的认识论充分体现了反对封建蒙昧主义、勇于进取和追求真理的时代精神。

除了物质实在论和认识论思想，恽代英在人生观、历史观、道德观等其他方面也有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认识。恽代英一生都追求高尚的人生，始终秉持积极进取、乐观向上、不断提升人格的精神态度。这一点，凡是认真阅读过他那至诚至真日记的人们，都会有强烈的感受。比如，他极为重视理想和信念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强调“信仰之引人向上”^③，人生必须有信念、立大志，不立志则无理想无希望，“有希望之人，如黑地有灯，则自增其勇往之气”，否则“举足略有崎岖即生畏缩之心，如人遇小挫折，即生消极之想是也”^④。由此激励青年人应该有崇高理想并为之不懈奋斗。无论今人对理想主义如何评价，这一点无疑都典型地体现了“五四”那个特殊时代的时代精神。^⑤

对于恽代英早期的哲学思想，有学者曾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代表着当时中国思想文化在这些问题上达到的最高水平”，“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理所当然地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⑥。这种评价是否恰如其分，当然还可以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恽代英深厚的哲学修养，无疑为他后来研究中国改造问题、思考中国的革命和发展道路打下了良好的理论

① 《恽代英文集》，上卷，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② 同上书，156页。

③ 同上书，44页。

④ 《恽代英日记》，342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⑤ 参见〔日〕小野信尔：《从恽代英看五四时期的理想主义》，载《东洋史研究》，1979，38（2）。

⑥ 袁伟时：《恽代英前期哲学思想试探》，见《恽代英学术讨论会论文集》，37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基础。

其次，恽代英还是近代中国一个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家。他关于教育的思想自成体系，多有可观或值得反思之处。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恽代英曾专门从事教育工作，担任过多所中学、中等和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与管理者，其教育思想也曾经历过从单纯的学校教育到注重社会教育的转变。尤其是他主张“养成健全的公民的教育”之有关思想，颇有认知价值和现实意义。^①

受时代的影响，恽代英是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开始其实践活动的。但当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开始重新认识教育与社会改造的关系。他肯定“教育确实是改造社会的有力的工具”，承认教育的社会功能，但也意识到单靠教育不能改造社会，主张把教育放到社会上去，认为“教育家必须把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打成一片”，强调“我们要改造教育，必须同时改造社会。要改造社会，必须同时改造教育。不然，总不能有个理想圆满的成效”^②。因此，国家恰当的教育方针必须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来确定。

基于这种认识，恽代英以为当时一般的所谓“教育家”其实办不好教育，他们太过于重视单纯知识的传授，甚至将其看作教育的全部内容，而在恽代英看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最急需的乃是能引导国民觉悟的革命者、能掌握政治经济局面的救国人才，因此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都应当朝这方面加以改造。正是从这样的国情认识出发，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情意的教育应当重于知识的教育”；“才能的教育应当重于理论的教育”；“社会科学的教育应当重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教育”^③。他还由此坚决反对教会教育，发表一系列文章抨击教会教育，认为它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重要方式，是“外国人软化中国的工具”和消磨中国人“民族精神”的手段。^④在当时反对教会教育的运动中发挥了实际的领导作用。

恽代英教育思想的核心，无疑是提出“养成健全的公民的教育”的主张，以及以此为中心阐发的一系列关于教育改造的思想。在恽代英看

① 参见中央教科所编：《恽代英教育文选》，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② 《恽代英文集》，上卷，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③ 恽代英：《革命运动中的教育问题》，载《新建设》，1924，1（3）。

④ 参见恽代英：《打倒教会教育》，载《中国青年》，1925（60）；《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载《广东青年》，1926（4）；等等。